

生蚝与青口

袁念琪

法国至今已去八趟。说起法国的吃,吃货多剑指生蚝(牡蛎),大有不吃就等于没去过法国之势。我对生蚝的初印象,最早见于莫泊桑的《我的叔叔于勒》中,“她们的吃法很文雅,一块精致的手帕托着牡蛎壳,嘴巴向前伸着,免得弄脏袍子。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了进去,牡蛎壳就扔到海里。”

第一次吃生蚝在科涅克,这个以干邑闻名的小镇属夏朗德省,该省生蚝获得“Label Rouge(红标)”认证,其中芬大奇蚝(Fine de claire)被誉为“蚝中贵族”。饭店是1908年开业的LE COQ D'OR(金公鸡),店堂内餐垫、座椅、靠背一抹紫色。我点的海鲜拼盘中,生蚝6个。在法国吃海鲜多拼盘,蚝、虾、螺等组合,置腰形大盆,或上海鲜下调料的两层托盘。不用任何佐料,要的就是原汁原味。

苏东坡吃蚝虽无“东坡肉”之名,却有文字记载,见1099年(宋元符二

年)给儿苏过信里。一是小蚝蒸,“肉与浆入水,与酒并煮,食之甚美,未始有也。”二是大蚝烤,“又取其大者炙热,正尔啖嚼。”他还幽默叮嘱道:“每戒过子慎勿说,恐北方君子闻之,争欲为东坡所为,求滴海南,分我此美也!”蛮荒地上被贬人,生活却在生蚝上开出花来。

朋友说诺曼底的生蚝好,该地区与夏朗德同列法国七大产蚝区。今年到诺曼底,方知当地美食有“三件套”:含生蚝的海鲜、卷饼和苹果酒。1944年“D日”行动登陆点之一的犹他海滩是著名产地,其生蚝肉紧实味咸鲜并带一丝奶香,全拜这超大潮汐和海浪所赐。成名甚早是布列塔尼北部康卡勒的生蚝,路易十四时期就为贡品。

无论在不濒海的阿维尼翁还是临海的尼斯,生蚝一样好吃。法国四季有蚝吃,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大规模人工养蚝国家,加之一面大西洋一面地中海,9月到次年4月是享用大西洋生蚝上佳时节,而地中海三钵蚝可全年享用。

法国生蚝名气响为俚老胚主打目标,吃青口是:撙草打兔子——捎带的。第一次听到“青口”是上世纪在多伦多,一看这不是上

阅读古人作品,无论诗词歌赋、散文小品,切忌望文生义。注家若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”,则或恐贻误读者;即使出于善良,有意郢书燕说,也必将见笑于大方之家。

《粤西游日记二》崇祯十年(1637年)

八月初五日日记:“若不有此行,只谓都峤南魁北峭,

一览可尽,而谁觉其幽悄至此哉!”“都峤”,即“都峤山”,新编《容县志》第三十二篇《风光名胜·风光》著录:“都峤山,又称南山,萧韶山,在容城南约10千米处,自古为容州著名宗教圣地、风景区及讲学场所,道书将其列为中国第二十洞天,1988年定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风景名胜

胜区。”然而游记所谓“都峤南魁北峭”何意?笔者所见注家全未予理会。有译文或译作“南面高大而北面陡峭”,或译作“南面高大,北面陡峭”,取义全同。两者皆涉及如何解释“魁”字,若以“高大”为解,则与《游记》取义适相反对。所谓“魁”,即“魁陵”,当谓小土丘。都峤山海拔743米(民国《容县志》谓之“高三百余丈”,当属夸张),若再论以相对高度,更无“高大”可言,故下文“一览可尽”之判语当属实录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:“夫周,高山、广川、大藪也。故能生是良材,而幽王荡以魁陵、龚土、沟渎,其有悛乎?”三国吴韦昭注:“小阜曰魁。”徐霞客《游恒山日记》崇祯六年(1633)八月初十日日记:“自沙河登山涉涧,盘旋山谷,所值皆土魁荒阜。”文中即以“土魁”为小土丘,正可为旁证。

海人的“淡菜”么,其实它的大名是“贻贝”。小小淡菜在唐朝元和年间,“明州(今宁波)岁贡蚶、蛤、淡菜”(《资治通鉴》)。

明明在海货,却在上海及江浙叫“淡菜”。据《浙江通志》:“浙人呼淡菜曰‘东海夫人’……去其壳,不着盐而干之,故名‘淡菜’。”又:“淡菜为蚌属,以曝干时不加食盐,故名。(徐珂《清稗类钞》)”

在上海,过去买淡菜到南货店,海味是其经营的土特产之一。小时候,家里烧冬瓜番茄汤会放淡菜,如同放开洋,其鲜味都到汤里,淡菜本身就没啥味道。

海货当是吃鲜活。这几年来法国,见青口总不放过;就连去年生日在南特,点了意大利面,也大大快朵颐了青口。大西洋的青口个头不大,色金黄肉鲜嫩,配些洋葱。与吃蚝

我在一家工厂干活,班组里的师傅们爱喝浓茶,用大号搪瓷杯,杯上印有工号。茶叶是战高温时发的,粗茶,味厚。沸水缸厚厚的木板盖上了个洞,

滚烫的蒸汽管通入,煮开一缸水费不了多少时间。边上放了并拢的两张八仙桌,是我们操作间隙闲坐之处。车间里有八仙桌,我至今还感到奇怪。神情恬淡、有点谢顶的陈师傅以前是厂总工程师,当时下放到我们班组。师傅们对他极尊敬,说“人家是有学问的人”。陈师傅的工作衣是班组里保持得最干净的,头发也梳理得纹丝不乱。他喝自带的龙井茶。那时我们几乎无书可读、无书可买,陈师傅却订阅了唯一公开发行的英文版杂志《中国建设》,里面彩色的图片

是当时任何报刊上都没有的。陈师傅随意把它放在八仙桌上,让大家翻看。总爱粘在他旁边的长脚小王,常常将杂志带回宿舍用英汉词典苦读。恢复高考后,小王马上就考进了外贸学院,仿若苦

《粤西游日记二》崇祯十年(1637年)七月二十日记:“今碧滩之上置镇峡堡,声势甚孤。”所谓“碧滩”,今名同,即今“碧滩”行政村,辖于今广西贵港市桂平市西山镇,位于黔江北岸。何谓“碧滩之上”?有注家注“碧滩”云:“不识碧滩

与镇远堡是一是二。”其译文则作:“今天在

碧滩之上设置了镇峡堡,声势十分孤单。”后出注家之译文:“如今在碧滩的上面,设置了镇峡堡,孤立无援,声势不振。”两者显然皆将碧滩与镇峡堡合二为一了。其实“今碧滩之上置镇峡堡”一句并非两者同在一处的意思。据相关方志著录,碧滩位于明桂平县城西北八十里,镇峡堡则在明桂平县城以西四十里的鸳滩上,两者相距近四十里。如果就两者与县城的距离而言,则碧滩较镇峡堡为远,故加“之上”于其后,显示出两者与桂平县城距离的远近不同,绝非同在一处。《明史·地理六》著录“浔州府·桂平县”有云:“桂平:倚。南有白石山。西北有大藤峡。北有黔江,一名北江,亦曰右江,南有郁江,一名南江,亦曰左江,至城东汇为浔江。东北有武靖州,成化三年置,万历末废……又南有罗秀土巡检司,又北有碧滩堡、镇峡堡,俱成化中置。东有牛屎湾堡,西有淹冲堡、秀江堡,俱嘉靖中置。”对于前两者所谓“俱成化中置”,也是分别言之意,并没有两者在空间相叠的意向。

《徐霞客游记》行文简约,惜墨如金,注家稍有疏忽,就有可能产生误解。



秋日(水彩画) 杨建勇

朱永超

一棵有着S曲线美的大树。大树看着居民在树下刷牙洗脸、生炉做饭。洗漱的脏水倒在树下,升腾的炉烟熏染着树身。它不计较、不生气,依然抽枝散叶、茁壮成长,为居民遮风挡雨,佑护着它能佑护的巴掌之地。它看着孩童玩乐嬉戏,看着大人休憩乘凉,像个不停歇的钟摆日复一日地行进着,记录着普通人、普通事、普通的生活。

棚户区传出要拆迁后,居民们一个都笑逐颜开,终于可以住上新房,结束三代人蜗居一室、每天倒马桶的日子了。很快,那里的房子就被夷为平地,一片空旷,只有这棵树还在。按照惯例,像这样的大树会被移走。但在未被移走之前,它就像一个老人,依旧站立着,注视着这里的一切,哪怕什么都没有。它,就是这里曾经有过的市井烟火气的见证者,同时也是亲历者。

奇怪的是,大树一直没被移走。整片区域朝北的一半建起了高层商品房,朝南的一半划拨给了旁边一墙之隔的蓬莱公园,枫杨树也划入了公园。不知是无意还是有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,苏智良教授在《夜光杯》上写了一篇《日军“慰安妇”研究33年的历程》,其中提到了“大一沙龙”。那里的屈辱往事,多年前我也是读了他的文章才知道。而我,去过那个地方。

小学五年级时,班上来位从山东农村来的女生,年龄比我们大些,叫李文英。那时正有一部电影《寂静的山林》上映,是男孩子们都爱看的反特片,里面的女特务也叫李文英。调皮

李家住东宝兴路、四川北路路口的独幢花园洋房,进门有个弧形的院子,栽满花木,一米高的大瓷花瓶矗立在台阶边。李父是解放后随部队南下的一位普通老兵,李母于是携女随军来到上海。当时此地可能是部队家属宿舍。李家房子小,只有一间朝西房,面积约十五六平方米,进洋房大门左面就是。她家摆设极简单,没有什么家具,只见一张大床靠墙。这床没有床架,南北两头都顶着墙壁,窗沿下面凿出半尺高的长内柜,也没有柜门。这是一般家庭里不曾见过的。补课时,我们就坐在床边。床高,小孩脚悬着碰不到地。李文英曾顺手从柜里摸出几样小物件给我看,她刚从乡下来,不懂这些,问我是什么东西。因为不能吃又不能玩,更不像玩具,我不感兴趣就没细看,现在也想不起来了。李家对门邻居房门常敞开着,摆设也差不多。后来才知道这里是“大一沙龙”,做过日军慰安所。联想少年时所见,才明白李文英家的屋子与常人不同的原因了。

“大一沙龙”位于横浜桥南面,它附近还零星分布着几处日军慰安所。我家老宅是四川北路1466弄“三新里”,该弄地处四川北路、虬江路口,是条外表光鲜亮丽的石库门三层楼弄堂。1466弄左边沿街面的一排房子,底楼是店铺,曾经有邮电所、服装店、五金店、四川泡菜店等。每家店铺与楼上房屋都不相通。几家店铺相连的中间有扇双开的大木门,门外面是21路等公交车站的停车站点,里面是

楼梯,直通二、三楼。几幢房屋的二、三楼墙壁是打通的,有条长长的通道。沿街的一面,仅用薄薄木板将房间隔成小小的开间。房与房之间隔而不断,因为板壁没有从地板一直隔到天花板,尚有尺把的距离,其间用寸把宽、尺把长的木条斜着隔开。日军就这样将原本独立完整的住房,强行“改造”成了慰安所。二十多年前,我见过一份虹口区印发的材料,里面就提到过这处慰安所。抗战胜利以后,上海市民住房紧张,这里改成了百姓居屋。我没有进过这地方,楼里的细节是听我妹妹们讲的。20世纪50年代后期,孩子们入小学按户籍所属地段分配学校,班里的小朋友都是左邻右舍的邻居。孩子们串东家、走西家很正常,各家居住情况由此熟悉。

仅四川北路而言,就我现在知道的日军慰安所就不止这几处。随着城市建筑的快速改建,四川北路变化很大,三新里成了四川北路公园。当年房主早已谢世,当年的孩童,如今也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。年幼时,我们对很多屈辱往事并不清楚,现在也只能凭记忆回顾点滴蛛丝马迹。我们这代人有责任、有义务把它抢救下来。苏智良教授说,它是世界二战史的一个部分。旧址拆迁了,但历史不能遗忘。

移栽。我宁愿相信这是公园管理方的有意为之,因为过了这一段,后面连着一段步道是笔直的。我没想到在如何处置一棵树的问题上,他们如此地“人性化”,以树为本的生态理念融入这一小段步道中,更融进了整座公园。

每次去蓬莱公园散步,我总要走一走这段步道,看一看这棵枫杨。它舒展的枝干、优美的曲线,仿佛在随风舞蹈,用独特的肢体语言庆祝着自己的新生,也回赠给人们绿意盎然的视觉享受。



消逝与生长

贺贺

某些事物在不经意间悄然消失,比如屋檐下那影子的沟壑,远处水洼上闪着的一点亮光,在院子树梢上盘旋飞翔,脖子有一小圈白羽的灰色小鸟,那朵复瓣有着葡萄酒色的、在风来时会微微颤抖的木香花,还有某种无法描述的情谊,生命在某个阶段给予自身的特质……它们都悄悄流逝了。

其实也不是悄然,事物的流逝都会在自己的轨道上发出细微的声响,只是我的心神不曾投注在这些细微之上。而它们却如空气,似水分,也如太阳的起落、月亮的升降,像血液的循环,构成我和我的周边环境。我们彼此的关联,在看不见的地方发生。

有些流逝会随着时间与季节的轮换重新到来,有些消失便不再复现,往往那些珍贵的、亲爱的、稀罕的,消失在这奔涌的巨大的时间之流中。这是一种永恒的无法抗拒的消亡。人对消亡的惊恐、对抗,又会在新的消亡中趋于平静和接纳。

是的,没有什么是可以抵抗的,消亡也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,它是构成万物总体的一部分,它也属于其中的多样性。

在时间中的消亡让人在时间中成熟,让人更能置身于这广博的、喧哗的世界,看见世界本身的寂静和要走向的那终极的荒凉。

因为消亡,无可抵抗的永恒的消亡,生命就要听任这命运吗?生命的存在有它自己的意志,一粒草的种子在石头缝里冒出尖小的绿芽,峭壁上盛开的无人阅读的花,一棵树一棵树立成一片森林,由一个单细胞分裂而开始生生不息的人类……

生命与消亡,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,一种永恒的循环。它们是这世界意义的本质与真相。



茶事

赵韩德

上课课后我才知道,现在大网红的茶,也曾有极受委屈的日子。茶自唐陆羽,逐步被深入认知与推广。《茶经》问世后,茶法渐渐升华,乃有以陆羽饮茶比于后稷树谷者。陆羽云:“……聊四五啜,与醍醐、甘露抗衡也。”刘禹锡也说:“……自傍芳丛摘鹰嘴。斯须炒成满室香……”但在魏晋南北朝时,茶被北方视作丑小鸭。南齐名士王肃去国奔魏,北魏孝文帝有次设殿宴,谓肃曰:“羊肉何如鱼羹?茗饮何如酪浆?”王肃对曰:“羊者是陆产之最,鱼者乃水族之长……唯茗不中,与酪作奴。”孝文帝弟弟彭城王干跪呼茗饮为“酪奴”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这段记录,可以说是茶的至暗时刻。之后,茶饮渐渐扬眉吐气。耶律楚材于雪中作茶会,诗句如奇茶般回旋高昂:“高人惠我岭南茶,烂赏飞花雪没车。”茶课老师说,我们也要像茶树一样耐得寂寞,深山幽谷里也只管倔强生长。

这使我想起一件事——特殊年代,

七夕会

赵韩德

七夕会老城厢的棚户区房屋简陋、住户众多、弄堂逼仄,兜兜转转、曲曲折折,像迷宫一般,陌生人走得进去,未必出得来。不知是谁,在这片棚户区的东南一隅种下一棵普通的枫杨苗,在错落凹凸的狭小空间中日夜长大,长成了



一棵树

一棵有着S曲线美的大树。大树看着居民在树下刷牙洗脸、生炉做饭。洗漱的脏水倒在树下,升腾的炉烟熏染着树身。它不计较、不生气,依然抽枝散叶、茁壮成长,为居民遮风挡雨,佑护着它能佑护的巴掌之地。它看着孩童玩乐嬉戏,看着大人休憩乘凉,像个不停歇的钟摆日复一日地行进着,记录着普通人、普通事、普通的生活。

棚户区传出要拆迁后,居民们一个都笑逐颜开,终于可以住上新房,结束三代人蜗居一室、每天倒马桶的日子了。很快,那里的房子就被夷为平地,一片空旷,只有这棵树还在。按照惯例,像这样的大树会被移走。但在未被移走之前,它就像一个老人,依旧站立着,注视着这里的一切,哪怕什么都没有。它,就是这里曾经有过的市井烟火气的见证者,同时也是亲历者。

奇怪的是,大树一直没被移走。整片区域朝北的一半建起了高层商品房,朝南的一半划拨给了旁边一墙之隔的蓬莱公园,枫杨树也划入了公园。不知是无意还是有